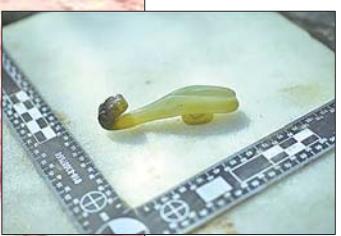




在新近评选的2016年度山东五大考古新发现中,两千年前的黄岛区土山屯墓群是最年轻的,然而带给世人的惊喜却并不比其他“前辈”少:难得的简牍文献、独特的土墩墓葬俗,揭示了鲁东南与江浙地区一段尘封许久的“蜜月”往事。



土山屯墓群考古现场及出土的玉器

土山屯墓群:坐拥琅琊地,浓郁江南风

□ 张九龙

西汉简牍出土还原县令生活

西汉末年,今青岛黄岛区祝家庄附近,诞生了一位刘姓子弟。他出身贵族之家,受过良好的教育,走上仕途后到江南一带任职。他先后做过萧令和堂邑令,主政一方时兢兢业业。可惜,他患有背疾,常年饱受病痛折磨,病逝后魂归故里。

这位堂邑令的墓就坐落在土山屯墓群之中。墓群位于黄岛区土山屯村东北1公里处的岭上,此前,地表曾耸立着14座大型封土,被定为区级文保单位。2016年5月到7月,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,对其进行考古发掘,清理出数十座古墓,大多属于西汉时期。

“善解人意”的堂邑令给两千多年后的考古者留下了“萧令之印”和“堂邑令印”两枚玉印章,直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。然而,惊喜还远不止于此。西汉时期讲究“视死如生”,喜欢把生前的生活场景、兴趣爱好都搬到自己的阴宅里,这位堂邑令也不能免俗。

除了财物,勤政的堂邑令还把自己当年批阅过的不少“文件”也搬到了墓里。今天,人们给这些“文件”起了个新名字,叫公文简牍文献,有简和牍之分,牍更宽一些。简牍相当于现在的纸张,只不过,当时造纸术还没发明,官员们处理公文都写在简牍上。

山东出土西汉木牍,这还是头一遭。木牍的材质是木头,木头虽然很容易获得,加工也方便,可日子久了会腐朽,长期完整保存非常难。考古学界有句俗语叫“干千年,湿万年,不干不湿就半年”,除非是敦煌那种极干旱条件,或者南方那种一直泡在水里的状态,否则,木质文物一般无法保存持久。显然,在山东半岛这种不干不湿的气候下,土山屯木牍的出土确实可遇而不可求。

从内容分析,这些木牍是墓主人在担任堂邑县令时的行政公文,涉及西汉末年堂邑县的户籍人口、钱粮税收、兵器库盘点和司法审判等。这些情况在字数有限的正史上显然不会有太多记载,故而对研究西汉社会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简牍是今人与古人隔空对话的一把钥匙,可以开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传奇。就拿其中一片来说吧,提到了一名草根英雄:戴福。当时,东南沿海一带匪患活动猖獗,戴福担任亭长,类似现在的村居“网格员”。然而,这个小人物面对海贼无所畏惧、英勇追击,最终为民殉职。如果不是堂邑令的无心之举,后人又怎么会知道他的英雄事迹?

独特土墩墓葬 江南风格浓郁

土山屯墓群的与众不同,在刚开始挖掘时就已经显现出来。站在制高点处望去,这里的封土像一个个巨大的土墩子,厚重、结实,气势不凡。

通常情况,建造坟墓的方式是挖个坑,把棺材放进去,再回填土,上面堆出一个坟头来。这种安葬方式,中国人已经用了几千年。然而,土山屯墓群的部分墓葬却截然相反:先在地面堆筑成高大的土堆,然后再在其上挖造墓穴,墓穴是高于地平面的。

这种墓叫土墩墓,多流行于南方地区,主要是因为南方多河流湖泊、地下水

上:萧令之印
下:堂邑令印

位较浅,如果在平地挖墓穴,很难做到防水防潮。古人非常聪明,早在五千年前,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就已经流行使用土墩墓了。土墩墓还有个特点,一座高大的封土之下,可以埋着多座古墓,虽然施工费时费力,但空间利用率高,“公摊”小。

可是,问题来了。土山屯墓群所在区域,无论气候还是地质条件,都与南方相差甚远,即使西汉的气候比现在湿润些,也没有采用土墩墓形式的必要。有意思的是,土墩墓不仅出现于土山屯,而且在周边及日照等地也有发现,是一定时期内鲁东南一种独特葬俗。显然,这种葬俗不是土生土长,而是从南方流传过来的。

除了特殊的葬俗以外,土山屯墓群出土的不少文物也具有浓郁的南方特色,与齐风鲁韵区别明显。部分墓葬中出现了原始青瓷,从种类、形态、釉色、胎质分析,这些原始青瓷并非山东的土特产。考古学者研究发现,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为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,是地道的南方“舶来品”。

堂邑令墓的几件文物似乎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。铺置于棺底的文物叫“玉席”,上面写着随葬品清单,不过并非玉制,专家初步认为,它应是铅钡玻璃材质,上面贴有金箔并雕有纹饰。这是古代的一种特殊工艺,山东省内首次发现,此前仅在江淮一带才有出土,是地域特征鲜明的古代葬器。与“玉席”同时出土的,还有一种叫“温明”的器物,同样是北方的首次出土发现,明显是受南方文化的影响。

四国文化碰撞 南北交流紧密

土山屯墓群显示,直到西汉末年,鲁东南的地域文化和山东其他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,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。

鲁东南沿海区域位于山东半岛,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。山东虽是齐鲁大地,然而在商周时期,土生土长的东夷部族实力雄厚,在与齐鲁两国交流碰撞的过程中,始终保留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。

进入春秋战国时期,列国纷争不断。当时,这里属于齐国,此后齐国、吴国争霸,两国在此长期展开拉锯战争。勾践灭吴后,越国势力又替代吴国在该地区与齐国竞争。至战国晚期,楚国势力向东扩展并消灭越国,将苏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版图内,并将势力深入到山东东南境地区,鲁东南沿海地区得以吸收了部分楚文化因素。

可以说,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,集结了齐、吴、越、楚四国政治势力,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拉锯及地理上的关联,使得这里深受四国文化影响,并且在经济、社会生活上,彼此交流频繁。

随后,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琅琊郡,包括西汉以来,黄岛区又长期属于琅琊郡,在同一行政区划内,一些文化面貌及习俗也得到了较好的深度融合,形成了琅琊文化。

除了陆上交往以外,海上经贸也不应忽视。齐国的“鱼盐之利”名震一时,当时鲁东南地区就已经开通了不少近海航线,因此,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、江浙沿海的经贸交往历史悠久、十分频繁。可以想象,在汉代,鲁东南区域与江浙地区的文化、经贸联系甚至比现在还要紧密。所以,土山屯墓群在研究齐鲁文化发展变迁中有着重要的作用,这也是其获评2016年度山东五大考古新发现的原因之一。

最近,由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·诺兰执导的二战史诗大片《敦刻尔克》正在国内热映。影片全景再现了发生在1940年5月的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:尽管此役成功撤出了英法30余万军队,但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,导致英国本土防卫吃紧。而比其早两年的徐州大撤退(也称鲁南大撤退)比它成功得多,不仅撤出被日军包围的60万中国军队,武器装备也随之转移,还重创了日军两个师团。

1938年4月,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,与日军相持于峰县城周边山区。蒋介石欲集中兵力在徐州与日军来一次决战,于是向第五战区增派兵力,总兵力达60万。同时,李宗仁致电蒋介石,指调60军由武汉开赴鲁南增援。而日军方面,集结精锐部队13个师团约30万人马,配备各种重武器,辅以飞机数百架,分6路向徐州包围进攻。4月底,双方在兰城店、禹王山、泥沟一线呈拉锯争夺态势,尤其在禹王山一地,来自云南的60军与日军苦战20多个昼夜。

禹王山位于台儿庄东南,京杭大运河东侧,海拔125米,相传远古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住过,山顶有座禹王庙,因而得名,是台儿庄周边唯一的制高点,在山顶俯瞰敌我双方的阵地,一览无余,地势极为险要。日军见突不破禹王山和运河防线,改为以部分兵力在鲁南正面牵制对方,形成四面包围徐州的态势,中国军队主力遂陷入极度危急之中。

由于日本飞机持续对徐州狂轰滥炸,徐州西关发现日军便衣队,第五战区司令部受到了极大威胁。5月16日,李宗仁果断命令放弃徐州,全军进行战略转移。除孙连仲的鲁南兵团守备徐州掩护撤退外,大军分为四路分别撤退:汤恩伯为总指挥的陇海兵团、廖磊为总指挥的淮北兵团、李品仙为总指挥的淮南兵团、韩德勤为总指挥的苏北兵团。为了避免被日军飞机发现,所有部队撤退都是昼息夜行,隐蔽行动。

5月18日,各路大军撤退就绪。李宗仁于当晚11时,率长官部职员、特务营、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,共约千人,乘火车离开徐州开往宿县,然后再往西撤退。可是火车刚行50公里,前方铁路就被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,将桥梁炸毁了,李宗仁等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。第二天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,与汤恩伯军团相遇。汤恩伯邀请李宗仁随20军团一起向西突围,这样更加安全。可李宗仁认为20军团是中国军队的精华,应抓紧脱离战场,恐长官部与其同行,拖累该军团,所以命令汤恩伯即刻率部西行。李宗仁则带领长官部一行向东绕过宿县,穿行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。一路上险象迭生,多次遭遇日机轰炸,甚至与日军的一支数百人的骑兵擦肩而过。李宗仁一行抵达涡河北岸时,与第7军前来接应的部队相遇,渡过涡河,进入第21集团军防线,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。

5月19日上午10时,日军13师团进入徐州,徐州沦陷。但日军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,中国军队的主力基本都胜利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。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向天皇报告说:“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,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包围起来,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,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,战果之微出乎意料……”

《李宗仁回忆录》中说道:“敌人再也没有想到,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五月十九日窜入徐州时,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。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,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。敌人四处搜寻,仅捉到了我方几个落伍的病兵……甚至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。这种情形,在双方百万大军的会战史上也可以说是个奇迹,彻底毁灭了敌人捕捉我军主力、速战速决的侵略迷梦。”蒋介石对“徐州失陷,我军整然西撤,损失甚微”大为满意,他在5月27日致李宗仁的密电中说:“鲁南撤退各军整然,殊为欣慰。”

徐州大撤退秩序井然,和之前的淞沪、南京溃败性的撤退相比,简直是一个军事奇迹。60万大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,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使日军战略决战的企图又一次化为泡影。它的成功可以与台儿庄大捷相媲美,不仅为后来的武汉保卫战积蓄了力量,而且对以后的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,也有重大意义。

鲁南大撤退: 中国版的『敦刻尔克』

□ 郑学富